

2017年3月28日

用大数据分析来测量和促进世界和平？

作者：牛金霞

如果和平可以测量了，某个家庭、社区或公司的“和谐值”可以像温度计上的数字一样显示出来，这个世界会发生哪些改变？

斯坦福大学的“和平创新实验室”就在试图测量和平并努力让这个世界增加更多“积极的和平”。

到底怎么做？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联合创始人马克·尼尔森（Mark Nelson）认为，得益于传感器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普及，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可以测量影响和平的多个维度了，这些技术对和平涉及的关键元素的记录、跟踪和分析也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带来的意义是，我们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积极干预，通过设计、测试新的科技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积极沟通和互动，用数据的实证结果来取代“直觉”，来帮建立人际、社区乃至国家之间的更和平互惠的关系。

简单来说，这个时代非常特别，它是一个大数据和物联网时代，是一个大范围的24小时的数据测量和收集成为可能，以及大量平行计算成为可能的时代，这不仅在改变科技和商业，乃至艺术和生活，它还改变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哲学理念:比如，它让原来不可测量的事情有可能能够量化了，比如和平，比如爱。马克和Facebook在2009年的合作已经证实，积极的社交行为，能够促进和平的行为是可以被测量的。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信息，我们使用的电脑、手机在无形中重塑着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演变，很多时候，这种重塑是不可预测的乃至危险的，也就是说，是有副作用的。比如网络成瘾症和无法集中注意力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被动的等待这些负面影响发生。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却在麦克卢汉之后发出了又一问：既然媒介技术迟早是要深远影响我们，我们是否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设计技术，来主动实现更多的我们想要的、期待的影响呢？（比如和平）呢？

这也其实是对另一个问题的探索：我们到底能多大程度上保证科技只用于好的用途，而不是用来伤害我们自身？马克的方案是，我们在设计一种新技术的时候，就先在实验阶段对它的影响进行充分的数据收集和测量、实验，进而选择最大化促进和平（或积极互动与合作）的行为和后果的技术实现方式来进行设计。这里的科技更多是会融入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比如电子日历、邮件和手机等媒介。鉴于媒介即是讯息，鉴于它如此重要，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主动设计。

很多人赞同一句话：没有社交媒体就没有今天的特朗普，这就是媒介变迁带给社会巨大影响的最好案例。某种程度上，美国总统的诞生史就是一部媒介的演变史。电视主导竞选的时代，美国人民实际上在全民选“演艺偶像”，哪个候选人形象更好，电视屏幕上呈现的更有魅力，他就会不断被加分。以前要成为总统，在电视广告上砸钱，深情的呼吁“ Yes, We can”（是的，我们可以）就成功了一大半，因为电视是一个人面对一群观众，候选人只要谈论大多数人关心的话题，赢得主流人心就可以了。但是今天的推特、Facebook不一样了，它允许候选人一对一的跟选民互动，大数据分析又可以轻易将选民的身份特征、需求和兴趣等呈现出来，候选人可以谈论选民真正关心的问题来影响选举，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率，它其实比电视的影响力强上百倍、千倍，而且候选人不用再花那么多钱来砸广告了。如此说来，社交媒体本应该让政治选举更公平，选出一位真正得人心的总统才对。

可惜，有两个站在暗影里的因素：第一，美国选举玩的是一场“少数服从多数”的数据游戏，是选民数量游戏，不是选民质量游戏，特朗普不需要赢得加州

尤其硅谷的人心，反正加州的票从来也没被算上过，他只要赢得“凄苦的大多数”就够了，这部分人教育程度很低？正好，意味着很容易被煽动和影响。第二，伴随社交媒体而来的是信息泡沫，每个人都身处大量信息的泡沫里，真假难辨，也给假新闻足够的滋生和蔓延空间。

存在即是合理，特朗普先生已经是总统先生了。硅谷人只能思考：下一个媒体时代是什么？会带来哪些改变和影响？我能否主动设计和控制这种影响？

不过，马克也说，他非常非常担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即便你用了最大的善意和最纯良的动机来设计和执行一件事情，最后带来的结果可能是让事情变的更坏。他举了自己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做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救援团队将粮食、资金和车辆等送去灾区，可惜，当地政府一面对救援物资的进入征税，一面以“合理分配”的名义垄断物资，送给灾区的车辆第二天可能就被涂成军车。即便在救援的粮食真正到达灾民的地区，因为它破坏了当地粮食商人和农民的经济链条，导致的结果是几年之后，那里的土地大量荒芜，人民更贫困。

这让我想到，佛教里看门人和菩萨的故事，看门人和菩萨互换位置，条件是看门人不许讲话，只能倾听。看门人看到一个富人先来祈祷，忘记了钱包，接着被一个来祈祷的穷人拿走了，这个富人匆匆赶回来找钱包，这时祈祷的是一个即将航行的旅行者，富人咬定是旅行者偷了钱包，两人争执不休。看门人终究忍不住，说出来真相，自以为是公平正义。殊不知旅行者因为富人不再纠缠，顺利登上了旅行的船只，而那只船很快沉没了。穷人因为没有得到这笔钱，无法给家人看病，导致病人死亡了。富人要回了钱包，可那点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马克的故事和看门人与菩萨的故事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我们所看到的因果都太表象了，我们对是非好坏的判断都是基于片面、部分事实的。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本着促进更多和平的善意来设计一种新技术，即便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对它能否促进和平的行为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和实验，我们对“促进和平行为”这一目的的衡量仍旧只是单一维度的，最终设计出来的结果会不会还有其他维度的后果？我们怎么保证我们不会把事情弄的更糟糕？

为了让马克不那么忧虑，我说，嘿，“好心办坏事”是挺难受，但重要的是动机，不是后果。比如，同样的行为，一个医生拿着一把刀插入了病人的心脏，

结果人死掉了，一个小偷把一把刀插入了无辜行人的心脏，也导致了死亡，我们判医生无罪，而小偷重罪呀。

马克则微笑说，不，医生拿手术刀插入病人心脏时，之所以会导致死亡，并不是纯粹的意外，而是他在“也许能救人，也许不行”之间选择了冒险，但是，

如果大范围的数据测量成为现实，在1000个类似的手术里，医生拿起手术刀，结果都是病人死亡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个医生，嘿，你不要再试了！在这个数据可以被大范围测量的时代，我不再相信动机决定一切的论调了。我相信，行为本身和其后果因为可测量，执行人就必须对其担负起责任来，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

“即便满怀忧虑，也要奋力一试，总要有人来做这个实验，我们不能一直等着被亲手造出的技术愚弄”。

马克的话颇有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味道”。